

争议。仅仅与一年前相比,中国已更加突出地成为主角之一活跃于广义软实力世界并发挥切实作用和影响:中国相对强劲的金融和经济成了西方和多数新兴工业经济体在困境中自觉选择的首要外在依靠;中国继续巨量购买美国国债已成为美国奥巴马政府的金融拯救和经济振兴计划的一大资金来源,以及美元地位的一大支柱;中国国内的“保八”目标直接关系到西方在衰退之中能否继续拥有对其更加紧要的中国市场;近乎千疮百孔的国际金融体制无论是重大改革还是小修小补或无以为继的刻板守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立场和战略。在狭义软实力世界,除改革开放以来坚持不懈、愈益有效的柔性外交以外,中国在 2008 年的新成就与全球性金融危机、经济衰退一起,开始令西方不得不承认当代中国的社会体制、价值观、政治文化、国策纲领的内价值和世界影响,并在发展中世界得到比先前更大的好评或赞誉;与此同时,中国最近开始积极、主动和比较具体地参与倡导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可以说揭开了中国在一个重大的狭义软实力世界“分舞台”上将大有作为的序幕。在广义硬实力世界,中国自美欧金融危机以来,已经引人注目和理直气壮地开始为中国的核心利益和尊严使用经济和外交

“惩罚”,以此正当和必要地对待侵害者和侵害行为。甚至在狭义硬实力的世界,中国多年来依靠本国人民的大力支持持续加速军事力量现代化,而且仅在美国金融大危机发生以来才几个月,就有一些理所当然和举世瞩目的重要新进展,涉及军力建设以及参与国际社会联合军事行动。

简言之,国际格局已经并且仍在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两方面是美国力量加剧衰减、中国力量愈益增进。然而,正是由于这种变化,中国在国内重大瓶颈问题之外,面临一系列与之相关联、非同小可的新挑战,包括认识和实践方面,其中有些必须尽快予以正确回答、正确应对。在某种意义上说,世界各强的根本瓶颈问题说到底属于一类,那就是为各自的社会提供具有真正持续活力的生活方式,其中蕴含世界主要难题的解决方向。它们之中究竟哪个能做到或首先做到这一点尚无答案,但那必然将在更长远的意义上决定未来的国际基本格局。中国要吸取当代美国的教训,牢记大概与希罗多德史书大约同时问世的《国语》所揭示的至理:“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未盈而溢,未盛而骄,不劳而矜其功……此逆于天。”○

国际金融危机的全球地缘政治影响

金灿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教授)

二战结束以来,世界经济经历过多次波折。引人注目的有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80 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机和 90 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这次出问题的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华尔街,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由美国次贷风波诱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是战后最严重的一次。它的严重程度虽然不及 1929 年的经济大萧条,但应该超过战后一般的经济衰退,因而一定会产生严重的地缘政治后果。

下面主要以中国在经济危机中的政策应对来分析可能出现的地缘政治后果。我对中国经济的分析是基于中国今年保八目标实现这一前提假定。经济

学界普遍对保八目标有所怀疑,但我认为中国保八的目标基本能够实现。理由有三点:从经济角度看,中国经济受损程度较小,面临的问题相对单一,主要是应对实体经济中对外贸易下滑部分,中国的金融系统基本健康。另外,中国经济问题源于国内政策调控和国际经济危机两个部分。在国际经济危机爆发之前,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下滑趋势,这是政府近年来为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而进行宏观调控的结果。因此,只要中国政府转变政策,加大经济刺激力度,经济危机来源的国内部分就可以消除。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具有超强的政治动员能力,这

是其他任何政府都难以做到的,也是多数经济学专业中心主义者难以估计的变量。从历史角度看,中国正处在工业化的高度增长时期,特定的历史阶段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中国保八目标一旦实现,就会在地缘和心理层面产生重大影响。第一,中国将是第一个走出经济危机的国家。按照世界银行、IMF和世界贸发会议的预计,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是 0.3%,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保持 8%,是世界的 16 倍,因而中国今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超过 50%。保八目标的实现将使世界看到中国抵御风险和抗打击的能力。一国的国家能力可从两个层面分析,即冲击力和抗打击力。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向世界证明了中国的冲击力;在去年的汶川地震中,中国已显示抵御灾难的强大能力,而如果中国第一个走出经济危机,将再次显示出强大的抗打击能力。

第二,中国今年的 GDP 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保八目标的实现会带来汇率的变化和人民币升值,为了刺激内需,大量发放的贷款会导致新一轮通货膨胀。这几个因素叠加,中国今年 GDP 按照可变价格折换成美元,将达到 5 万亿美元。而日本今年的经济增长最乐观的估计是 -2%,再加上日元对美元可能出现贬值,日本今年的 GDP 将比去年萎缩 13%,回到 4.3 万亿美元的水平。因此,中国的 GDP 将超过日本,位列世界第二。

第三,重新反思奥运。去年的奥运反映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和现代化水平,是中国崛起的重要标志。由于中国崛起是亚洲崛起的实质所在,奥运又成为改变东西方关系的事件,意义非常重大。但是奥运后国际上出现了经济危机,中国国内发生了“毒奶粉”事件,人们的注意力被转移,对奥运的反思就中断了。如果今年中国第一个走出危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一定会带来民众心理的变化。人们会重新反思奥运,评估奥运对中国和世界的意义。

上述三个影响意味着中国的综合国力和战略地位将大大提升,这将导致三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方面,热钱可能会涌入中国。一旦中国保持相对高速的经济增长,正在各处隐伏等待投资机会的资本一定会疯狂涌入中国,形成新一轮经济泡沫。如果控

制不好,就会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外部社会对中国的心态会发生变化。一部分小国会产生顺从心理,而大国则会更加紧张,对中国的嫉妒感和戒备感都会上升。需要特别关注的是美国的态度。到目前为止,美国对华采取的是接触政策,其前提是美国的自信,即相信自己能够掌控中国的未来。一旦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的自信心是否能够维持值得怀疑。一个没有自信的美国会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政策值得密切关注。此外,国内民众的利益诉求会提高。当人们普遍接受中国是个穷国这一认知时,人们对自己的困难处境能够基本接受。而当中国 GDP 占世界第二位时,人们就很难再接受贫困的现状,要求减少贫富差距、强调利益分配公正的声音会进一步增多。可以预见,未来中国的国内治理将会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尽管如此,中国的成功还会带来更多的战略收益。首先从国际层面看。第一,中国的国际经济和金融决策权会上升,表现在中国更加积极参加重大的国际经济和金融会议,在 IMF 的投票权预期会增加等。这对中国的经济交往和对外贸易具有重要作用,对增强世界经济体系本身的公正性也是有利的。第二,中国会获得更多的海外投资机会,由贸易大国变成贸易兼投资大国。经济危机后,中国在战略物资购买、高新技术采购和海外品牌兼并等方面会有更多的机会。第三,人民币国际化开始启动。中国与周边许多国家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指定香港成为地区人民币结算中心,这都是人民币国际化启动的标志。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发展还难以预测,但至少走出了第一步。

再从国内层面看。第一,在经济发展战略上由出口导向转变为内外需平衡驱动。长期以来,中国实行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战略,在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代价。经济危机导致外部需求减少,中国必须大力培育国内需求。内外需平衡的战略在结构上更加合理,在效果上更具有可持续性。第二,产业升级的速度将进一步加快。经济危机暴露了中国在产业结构上的劣势和脆弱,将为中国的产业升级计划提供额外动力。目前,国务院先后出台了 10 大产业振兴计划和科技创新计划,对推动中

国产业结构升级将起到重要作用。第三,为了扩大内需,也为了解决长期存在的不公正问题,中国将加速全民社保体系的建设。扩大内需的前提是民众具有基本的安全感和稳定的未来预期,而根本途径就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综合起来,基本的判断是,中国将是第一个走出经济危机的国家。美国会第二个走出危机,理由是美国虽然是这次危机的来源和“麻烦”制造者,但却利用其既有地位成功地转嫁了危机。因此,与中国以外的经济体相比,美国的受损程度更小。至于欧盟、日本、印度和俄罗斯等经济体,则将根据其经济状况和政策应对来确定谁是第三个走出危机的国家。如果这个预判成立,国际战略格局将产生微妙而复杂的变化。首先,中国很可能是这次经济危机的赢家,在后危机时代中国的国家实力会上一个新台阶。中国在多强格局中的地位将进一步增强,但由于中美两国实力差距仍然巨大,中国并不具备挑战美国地位的实力和意愿。其次,美国成为第二个走出经济危机的国家,其政治后果相对于中国以外的其他大国来说,将使美国的地位不减反增,“一

超”地位得以巩固。但由于在危机爆发前,美国的软力量已经有所下降,这次危机进一步削弱了美国的绝对实力,未来美国的“一超”地位不会像以前那样突出。最后,由于欧盟、日本、印度和俄罗斯等经济体走出危机的速度将慢于中美,它们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将受到削弱。至于它们之间的实力对比则需要视其在危机中的表现来确定。因此,综合的结论是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不会发生质的转变。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有所下滑但继续维持,中国在多强中的地位将得到提升但没有达到比肩美国的程度,而其他大国的未来地位则充满变数。

经济危机所导致的国际格局变动对中国具有启示意义。第一,在后危机时代,美国仍然是最强大的国家,维持中美关系稳定是中国大国外交的重点。第二,中国实力地位的凸显使得外部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和心态更加复杂,如何消除外部的战略疑虑是中国外交面临的重要挑战。第三,中国由于第一个走出危机,具有更多的能力资源和回旋空间,需要抓住危机所带来的机遇,为全面崛起奠定坚实基础。○

对金融危机催生世界新秩序的思考

王在邦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研究员)

随着 20 国集团伦敦峰会落下帷幕,当下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如何影响国际体系转型,愈益成为世人普遍关心的问题。从历史、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诸角度综合审视,我们有理由认为,此次百年一遇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启动的系统性调整,将使未来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更加平衡、有序、稳定与和谐。

历史地看,每次全局性危机动荡总在某种程度上促使相关国家反思并设法避免悲剧重演。17 世纪上半叶三十年战争促使各国签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9 世纪初拿破仑战争后形成欧洲协调。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以前,欧美民族国家形成但发展尚不成熟,各国经济联系并不充分,经济危机频度很高,但规模及其政治与社会影响都相对有限,通过某

种制度性安排来应对、防范危机的意识和理念只是少数精英的遐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危害空前,促使各国在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同时建立起国际联盟。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导致德、日、意走向法西斯主义,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而促使反法西斯同盟国筹划成立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形成包括政治安全、金融、贸易和发展的国际体系综合性制度安排。上述世界历史进程清楚说明,冲突的危险与损害越大,各国强化合作以抑制和避免冲突的意愿越强。人类社会自组织进程就是由野蛮到文明、由无序到有序的演进过程,包含着矛盾的形成、扩展、激化与解决,展现出人类社会矛盾性与统一性螺旋式上升的逻辑。